

汉藏语言的音节显赫及其词汇语法表征*

刘丹青

[提要] 本文用库藏类型学显赫范畴的概念分析汉语及其他汉藏语言中音节显赫现象, 包括声调在音节显赫中的作用, 同时分析音节显赫在词汇语法乃至文学文化诸方面的表征, 包括量词和连动式的显赫度与音节显赫度的相关性, 这些表征可以视为音节作为显赫范畴的超层级扩张功能。文章还指出, 音节显赫度在汉藏语内部存在显著差异, 壮侗苗瑶等东南部汉藏语音节显赫度最高, 往西往北渐次降低, 位置偏东南的彝语支语言则是藏缅语中音节相对显赫的。汉语方言音节显赫度差异的地理态势与之基本相符。这一区域性表现显示语言接触在音节及其相关范畴的显赫中起关键作用。

[关键词] 音节显赫 词汇语法表征 汉藏语言 量词 连动式

引言

音节显赫, 属于语言库藏类型学(刘丹青 2011、2012)所关注的显赫范畴现象。显赫范畴是语言库藏类型学的核心概念, 是指语言中功能强大、具有扩张力的范畴。显赫范畴概念不仅适用于已有较多研究的形态句法, 也适用于语言的所有层级, 包括音系、韵律和词汇。每个范畴的显赫度评估须结合语种内外两个维度。在语种内部, 显赫范畴是相对于其他范畴较显赫的范畴; 在语言之间, 显赫范畴是相对于其他语言中的同一范畴较显赫的范畴。参考刘丹青(2012)对显赫范畴属性的说明, 再兼顾语法以外的层级, 略去对非语法范畴不适用的指标, 本文主要依据以下三点来评估显赫范畴:

- 1) 显赫范畴使用频率高, 得到显著表征, 使用时受限制少。
- 2) 显赫范畴都拥有自身范畴或自身层级以外的扩展功能。
- 3) 显赫范畴在心理层面容易感知和激活。

其中第2)点是显赫范畴的核心特征和主要显赫效应, 第3)点则是显赫的内在属性。

对于汉藏语系及其周边语言的类型特点, 以往已有学者进行过总结, 其中 Enfield (2001) 在 Matisoff、Bisang 等学者既往研究基础上对“大陆东南亚”地区(Mainland Southeast Asia, 简称 MSEA)多语系语言的共性概括, 大致反映了除西部北部藏缅语以外广义汉藏语系的重要特点。他提到的几点是: 1) 缺少格标注或互参标注, 主宾格之别靠语义和语用环境, 最后

* 本文是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项目“汉语口语的跨方言调查与理论分析”的成果之一, 其不同版本和部分曾先后在首届燕京民族语文工作坊(北京, 2016.12)、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25届年会(布达佩斯, 2017.6)、第50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北京, 2017.11)等处报告, 获陆俭明、洪波、罗仁地(Randy LaPolla)、戴庆厦、孙宏开、潘悟云、陈卫恒等教授的讨论指教, 很受教益, 一并致谢。尚存问题均归作者。

可依赖的区分方式就是语序；2) 特别容易将诸如谓语-论元关系、时态、体貌-情态等语义留给语境来解读，常规的话语经常难以脱离其所在语境而获得确切解读；3) 都使用量词来实现计数、个体化及名词指称等功能；4) 词调（指声调）是一个显著的区域特征，但并非都有，多数南亚语阙如；5) 音节末尾的辅音是严格受限的，只有一小部分辅音库藏用于音节末尾。

本文拟以库藏类型学视角来审视汉藏语系的显赫范畴，重点考察汉藏语言中的音节显赫（含声调显赫）现象，因为音节显赫是汉藏语中一项根本性特征。音节显赫，孕育了语言中广泛的类型后果，因为其显赫效应能扩展到本层级以外的层级，体现了显赫范畴最本质的属性。Enfield 所概括的某些形态句法特征，就直接间接地跟音节显赫有关，可以视为音节显赫在词汇句法层面的表征。同时，汉藏语系内部音节显赫度存在显著差异，并在词汇句法层面得到展示。这也是本文着重关注的方面。

一 音节显赫

音节在任何语言内部都是音系中的显赫存在物，是心理上比音素等低层单位更容易感知到的单位。^①然而，在不同语言之间，音节的显赫度有极大的差异。我们先重点分析汉语音节显赫的一些表现，然后再观照一下汉藏语系的情况。

1.1 古今汉语大体上都属音节显赫的语言，但是显赫的方面和程度古今颇有差异

1) 现代汉语（含方言）音节结构比较简单，基本上是“(C)(V)V(V/C)”，没有上古汉语很可能具有的复辅音。其中能成为音节开头的辅音 C 较多；音节末尾辅音 C 极少，最多如粤语的 6 个[p t k m n ŋ]，少的如北京话只有两个[n ŋ]。有的方言[n]~[ŋ]没有音位对立，若再无入声，则音位上只有一个辅音韵尾。元音的组合能力也很受限，这使得汉语音节总数很小，如普通话只有不带声调的音节约 400 个。母语人需要感知的音节数量少，对每一个音节的身份（是否为母语所有）很清楚。

2) 汉语音节内部结构高度模式化，音节之间的组合边界分明，没有模糊地带。音节是汉语范畴中最容易确定组合边界的单位，从无划界的感知困难。汉语著作无须像拉丁语、英语等印欧语的教材那样详教音节切分规则（有的规则可能只是人为规定）。^②而汉语里小于或大于音节的单位则划界常遇异议。比如，在音段音位层面，介音到底跟声母组合还是跟韵母组合，就有不同的看法（王志洁 1999）；有些方言中某些阳声韵音节到底是[an, aŋ]一类双音位组合，还是[ã ã]一类单个鼻化音位？这些并不容易确定，标注因描写者而异。再如语法单位，词、短语、小句等单位的划界都有一些争议之处，如“大树”“唱歌”“走开”是复合词还是短语？唯独汉语的音节，其切分毫无疑问。

3) 汉语的声调产生之后便跨越在音节之上，给音节边界的感知加了一道标记性大盖。

4) 汉语音节间音渡实际只是音隔，除了“啊”等个别语气词外，不发生英语音节间那

^① 音素文字的字母表都要用音节形式来念，如 A[ei]、B[bi]、C[si]等，这本身就说明了音节更加显赫。张洪明（2014）：音节是许多音系规则运用的辖域，如西班牙语的 r 强化、送气音化、软腭化等。其他对音节敏感的规则还有美国英语的喉音化、英语音节首清塞音的送气、德语音节末阻塞音的清化等。

^② 如拉丁语有如下的音节切分规则：i. 当两个元音间只有一个辅音时，归后音节：ho-mō‘人’；ii. 元音之间不止一个辅音时，第一个辅音属前，其余属后：sep-tem‘七’；iii. 如果两个辅音是塞音+流音，则整体属后：pu-bli-cus‘公共的’；iv. 复合词的音节界线在其组成部分之间：ad-est‘为此’。（信德麟 2007：24）

种拼合,如“西安”不会念成“鲜”xian,“天安门”不会念成“天南门”tian nan men(这是欧美人念此名的常见读音),“巴南”不会念成“斑腩”ban nan。反过来,音译英语 Hamilton 时必须在“哈密尔顿”和“汉密尔顿”等译法中做出选择,读音也随译法而迥异,凸显了音渡的隔离作用。韩国语音节显赫强于英语,但是音节间的相互影响大量存在,像辅音韵尾会自动成为后面零声母音节的声母,塞音韵尾会被后音节开头的鼻声母同化为鼻音,如-k + m- > -ng + m-, -k + n- > -ng + n-, (参看李翊燮等 2008:22)与汉语形成鲜明对照。

5) 对小于音节的语音单位感知模糊。汉语日常用语中对音节这个单位有多种称说法,如“字”(说了两个字,三字经,一字师)、“音”(单音词,双音词)、“言”(五言诗,七言诗),说明这是个被显著感觉到的单位,人们经常需要称说它。而其他语音单位很少在日常语言中提及,“韵”(指韵母除介音外的部分,即整个韵基)在涉及诗歌等韵文时还会受到关注;音素音位则最缺乏清晰感知,没有日常称说词。

音素音位在很多语言中是常用形态要素。例如英语的复数后缀[s],动词过去时后缀[d]等。汉语形态一般都要以音节为单位,(刘丹青 1993)即使真的存在音素级的形态单位,也被描述为音节或韵母的变化。如江西石城客家话有一种“子变韵”小称,就是在韵母后加韵尾[t],例如:(温昌衍、温美姬 2004)

(1) 鸡 kie¹⁴³ (小鸡) 猪 tsə¹⁴³ (小猪) 牛 ŋəu¹⁴³ (小牛) 间 kan¹⁴³ (小间) 枪 tsəŋ¹⁴³ (木枪)

这些小称形式就是在原词上加个韵尾[t] (“子”后缀的弱化),但是描写者并不将其描写为添加词缀[t],而是描写为变韵(有的学者称为变音),即韵母变化或整个音节变化了。

6) 汉语的历史音变都是音节内因素——声调互动驱动的。其他语言大量存在的跨音节影响导致的音变,^①在汉语历史音变中很难见到。如汉语历史上发生过的以下重要音变,条件都在音节之内:

舌头音变舌上音:二、三等韵前,即某种介音(王力 1980:73 认为是 i 或 e)的影响

双唇音(重唇音)变唇齿音(轻唇音):合口三等韵前

见组字和精组字的合并(尖团合并):介音 i, y 之前

上古塞韵尾丢失变去声:因为韵尾是浊塞音 g, d (本尼迪克特 1984:180)

上古部分侵[-m]部字入冬部[-ŋ]:有合口介音[u]

《中原音韵》韵尾[-m]消失:声母为唇音(凡帆范犯泛品)(王力 1980:135)

中古平声调分化为阴平阳平:以声母清浊而定

^① 这里说的是系统性规则化的音变,不包括零星出现的语流音变。这类语流音变也见于汉语,会影响到个别字词的读音和音变,如“邯郸”的“邯”古音不收声旁“甘”的[m]尾,而收[n]尾,就跟后面“郸”字舌尖声母的逆同化有关。(参看施向东 2002)系统性规则化的音变,如日耳曼语第一次辅音转移规则是:原始印欧语的双唇清塞音在音节开头、或前接重读音节、而前面不是另一个清辅音时,变为清擦音。此演变后的两种条件都由前面的音节决定,超出了所在音节的范围。(Trask 2011:70)再如形态语言中的很多形态音位也经常是受相邻音节影响而产生的变异,如英语否定前缀 in(incredible)受后接音节影响分别形成 -im(improper), -il (illegal), -ir (irregular)等变体。这类变异也可能凝固为复杂的形态规则。如芬兰语语法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讲词干尾音如何因为后加形态的不同而产生变体,常常涉及音节间的相互影响,例如词干 kiele- (语言) > kiele+n (领属格) /kiel+tä (部分格) /kieli+kin (语言也)。(弗雷德·卡尔森 2016:67-68)同时,也有很多形态成分加在不同的词干音节后形成不同的变体,注意以下名词的部分格后缀: talo+ä (房子-), tie+tä (路-), kone+ttä (机器), kirje-ttä (信)。(弗雷德·卡尔森 2016:119-123)

7) 每个汉字在尺寸上都对应汉语中的一个音节,使得汉语音节有了视觉符号的表征,音节的地位和感知被加固并强化,进而通过书面语对汉语产生一定的反作用。

汉语学界有一种字本位说,强调“字”这一级单位在整个汉语系统包括语法系统中的首要地位。该学说实际上注意到了音节显赫现象并加以强调,因为字对应的音系单位就是音节。这是很值得肯定的。但是,该提法将“字”视为整个汉语及其语法系统的基石,却是不妥的。对此,陆俭明、郭锐(2000),陆俭明(2011)已经有很好的分析。其实,即使仅在音系层面,字本位的提法也难成立,兹补说如下:

1) “字”首先是汉字书写单位,而音节显赫不受书写文字的限制。对于曾经庞大的文盲群体来说,“王贵”是两个字,“李香香”是三个字,不用识字就知道,这里的“字”就是音节的代用语。对不用汉字甚至尚无文字而音节显赫的汉藏语来说(详后),字本位也无从谈起。因此,是音节显赫,而不是字本位。

2) 汉字单位的显赫,是音节显赫派生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很多文字在早期都带音节文字的属性,例如近东古老的苏美尔文字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时,就从语义符或词符阶段发展出一些单纯表音的字符,这些字符都对应音节单位。(吴宇虹等 2015:11)但是近东地区的古文字最终都发展成音素文字,音节文字不复存在。而华夏先民造出了以音节为单位尺寸的语素文字汉字,之后它一直稳固地存在,没有转化为其他符号系统。这与汉语的音节显赫有关,因为基于音节尺寸的文字适合音节语言母语人的语感。另一方面,汉字也有反作用,从一些方面固化并强化了音节显赫。

3) 汉字形成之初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此后平均词长的历时渐增也不影响语素一直以单音节为主,并且绝大多数音节都对应一到多个语素,由此形成汉字的“形音义”三维,成为音节显赫的伴生现象。其中,汉字作为音节单位是第一位的、无条件的;作为语素单位是有条件的,即语素限于一个音节。当音节和语素不一致时,汉字只迁就音节,不迁就语素。除了很晚起的儿化现象,汉语只有一字一音节律,没有一字一语素律,例如记录叠音词、连绵词、多音节纯记音专有名词(包括非汉语源头的专名)等多音节语素,汉字字数只管音节数,不管语素数。例如“窈窕、逍遥、匍匐、缱绻、邂逅、鸳鸯”和“摄提格、赤奋若(均为星座位置)”等。此外也有语素小于音节的情况,一字一音节多语素,如“诸”(之于),“旃”(之焉),“盍”(何不)、“甬”等。所以,汉字作为“音节-语素文字”,首要的是音节文字,不能简称为或简单理解为“语素文字”。字本位说试图反映的现象,其实是汉语音节显赫及其伴随现象,汉字是音节显赫的产物。将音节显赫称为字本位,有倒果为因之弊。

1.2 汉语音节强大的扩张力

人类语言中音节及其组合的基本功能是用作语素、词语的物理载体。汉语音节的显赫性首先表现在它自身有更多机会直接成为表义单位(语素和词),母语人对音节的感知更加显著。而作为显赫范畴,更重要的特征是扩张力。那么,哪些是汉语音节显赫的扩张表现呢?就是那些超越音-义对应的功能,分述如下。

1.2.1 音节数目本身成为基本词类的一种外在表征

音节的组词表义功能,靠的是自身的语音特征——音段特征及超音段特征,但是汉语中由具体词语中抽象出来的音节数目,成为一个对语法词类即词性有很强制约力的因素。汉语母语者对音节数的特殊敏感,投射为对词类长度的严格制约。刘丹青(1996)通过常用词统计展示了普通话主要实词词类与词长的相关性,显示主要词类各有典型词长——动词是单音

节,名词是2-3音节,性质形容词大体介于两者之间。词长不达标或超标就不能构成该词类的典型成员,并且影响其句法功能。词典中对词性的标注正反映了这一语感。例如,《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及以前各版):【生产力】是名词,注音为 shēngchǎnlì,而意义高度接近或相关的【生产能力】和【生产关系】都处理为短语,注音分别是 shēngchǎn nénglì 和 shēngchǎn guānxì,显然是因为音节数目超标了。^①【串】是动词,注音为 chuàn;【串门】是离合词,注音为 chuàn/mén,即合时为词,离时为动宾短语;【串亲戚】就是短语,注音为 chuàn qīnqi。

因为音节数高度受限,音节数成为这些词类的外在标记,进而影响到词语的句法功能。陈宁萍(1987)就曾关注到双音节动词向名词漂移的情况。

比较一下,对音节数不如汉语敏感的语言,如俄语、日语,可以接受的各类实词的音节数跨度或者说词长弹性要大得多。例如:

(2)<俄>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о(义务;名词)рекомендоваться(自我介绍;动词)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ый(大概的;形容词)~дом(房子;名词)день(天;名词)сад(公园;名词)рад(高兴;短尾形容词)

(3)<日>黒豆 kuromame 叢 kusamura(草丛,灌木丛)くたびれる kutabireru(累了)~魔 ma(魔鬼)

音节显赫导致汉语词汇的音节数分类成为显著常用的分类,单音词、双音词、三音节词、四音格等成为汉语各层面包括形态句法描写中最常用到的概念。吕叔湘(1963)就从很多方面展示了音节数对句法规则的强大制约。音节数是很多形态句法规则的刚性条件,如“粮食/饲料/机械/家具/服装/鞋业(*鞋)/酒类(*酒)公司”。“鞋”和“酒”由于是单音节而在公司名中必须改取一定的双音节形式。而词的音节数分类在很多非汉藏语的语法学中并不常用,语法书基本不会提及。

1.2.2 音节数成为一些特殊习语类别和特殊句法格式的主要韵律特征

例如,惯用语以三音节为首要特征,以“1+2”动宾式为典型形式,如“走后门、挖墙脚、拍马屁、唱高调”等。成语则以四音节为最显著特征,如“胸有成竹、一泻千里”等,而且以对称四音格为典型形式,如“水落石出、走马观花、赏心悦目、浅酌低唱、风餐露宿、朝三暮四”等。惯用语和成语存在多项对立的属性,包括语体、历史文化蕴含、感情色彩、句法功能(松散与紧密)。对立的成因有多种,其中音节数的作用不可低估。

对称四音格也是很多半固定口语词语的共用构式,以状态描摹为其语义特征,如“东看西看、探头探脑、上蹿下跳、想来想去、走进走出”等。

音节数相等的对称手段成为汉语很多特殊格式的必备要素,很多不合格组合因对称而合格,如“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刘丹青 1982)从而成为音节显赫的重要语法表征。

1.2.3 承载众多表达功能和文化功能的载体

基于音节数的形式,不但具有强大的构词和语法构造功能,而且也成为汉语(及同类语言)一系列文化现象的核心要素。汉语古典诗歌及某些文体最显著的分类是按字数(音节数)进行的,如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四六骈文、长短句。字数是诗律词律中最刚

^①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最初都来自西方语言的翻译,本来都是短语,没有词和短语之别。如英语分别为 production forces 和 production relations。到汉语中仅因为音节数而分归词和短语。

性的法则。童蒙韵文读物《三字经》就以字数命名。

除了诗歌，还有诸多语言文化现象以音节数为基本属性。

姓名。汉语姓名长度只有极端有限的音节数种类。姓氏以单音节为绝对优势，双音节占比极少，而且常在使用中被简化（诸葛>诸、葛；夏侯>夏；令狐>令）。这与词语的双音化趋势看似背道而驰，实际是因为汉语单姓不单用，姓名连用为常，推动了复姓的单音化。名字基本只有单双音节两种选项，比例因时代而异，与单音节的姓构成双音节或三音节的全名，符合汉语名词的典型词长。复姓+双名的四音姓名是汉族姓名的边缘形式，也是汉族姓名或少数民族汉化姓名音节数的极限。外国汉学家、留学生取中国名字，也全部纳入 2-3 音节的框架，并且尽量取貌似“1+2”形式的姓名，如“高本汉、龙果夫、马悦然”等。

地名。传统的汉语地名、水名都与名词的音节数状态一致，以双音节为主，少数三音节地名为相对后起的，如“牡丹江、黑龙江”。单音节的地名则须加上一个地理通名才成词，如“广州、沙市、聊城、吴县、固镇”。山丘名则为 2-3 个音节，如“泰山、衡山、华山、昆仑山、太行山”等。比较德国地名的词长弹性：Bonn, Yena, Göttingen, Berchtesgaden。

对仗。骈文、对仗诗句和对联都属于上下句表达形式类同、以两句音节数相等为必要条件，加上其他词性和结构对称等要求。

二 汉藏语的音节显赫状况

广义的汉藏语系总体上是音节显赫语言，但是内部各语言存在音节显赫度的差异。

2.1 汉藏语言大部分是声调语言，尤其汉、壮侗和苗瑶都是声调语言。声调是将音节包装成整体得到凸显的重要因素，也是母语人辨别音节界限最可靠的依据。在这个意义上，有声调的汉藏语都具有音节显赫的特点，而且总体上调类数目越多、对声调对立的感知能力越强，单字调越稳定、声调和音节越显赫，如汉语粤方言、客家方言、壮侗语言。反之，单字调不稳固、变调和轻声较多的语言方言，会导致声调显赫度和音节显赫度的降低，例如北方官话的轻声、吴语的连读变调、西北方言单字调的不稳定。没有声调的汉藏语，不考虑其他因素，音节显赫度应当是语系内最弱的，如安多藏语及一些喜马拉雅地区的藏缅语。

声调是加在音节上的超音段成分。声调显赫和音节显赫呈互利关系。声调显赫会固化和强化音节显赫。音素等下层单位和音节同为音段单位，是大小单位的关系，其显赫度是竞争关系。音素等下层单位的显赫，会摊薄音节的显赫。

2.2 音节结构复杂、特别是复辅音复杂的语言，母语人对音素感知较敏感，音素音位的显赫度较高，音节显赫度就会相应降低。例如藏文一个词可以有多达四个辅音构成复辅音，包括词根内固有的辅音和辅音前缀，如 bsgrims “安居”。（孙宏开 1999）丰富的复辅音会强化母语人对辅音的（独立于元音的）感知，也助长辅音单独充当形态要素。如上引藏语词 b 和 s 都是前缀。复辅音丰富的羌语也有单独的辅音形态，像麻窝羌语构成动词致使式的方式之一就是前置辅音 r-，例如：（刘光坤 1998:170）

(4) guə “穿（衣）” ~ rguə “使穿”

再看黄成龙（2006:128）描写的蒲溪羌语。动词的人称标记主要是由动词后的辅音音位和零形态的对立构成的，即：I 人称 -ɿ II 人称 -n III 人称零形式。例如：

(5) ŋa tshu dzeɿ. no tshu dze-n. thala tshu dze.

我 饭 吃-1 你 饭 吃-2 他 饭 吃-3

这里，后缀-¹表示第一人称的一致关系，后缀-n表示第二人称的一致关系。而在命令式里，后缀-n又用作动词的复数后缀：

(6) no (tshu) kue-dze! ~ kuela (tshu) kue-dze-n!

2sg:tp 饭 imp-吃 2pl: tp 饭 imp-吃

你吃!

你们吃!

辅音韵尾在峨口羌语中也可以用来构成名词化后缀，例如：(马学良 2003:303)

(7) zdz₁ (生病，动词) > zdz₁m (病人，名词) | dzə (吃，动词) > dzəs (食物，名词)

复辅音及辅音韵尾的多寡和辅音形态功能的相关性，也表现在藏语中。安多藏语在藏语诸方言中保留古藏语更多的特征，包括复辅音和辅音韵尾较丰富。(马学良 2003:147) 在安多方言道孚牧区藏话中，甚至有多达一百多种不同形式的辅音组合。(马学良 2003:169) 与此相关，在古藏语的形态向现代藏语简化的过程中，安多方言保留的古藏语形态比卫藏方言和康方言多。(马学良 2003:171-172) 这些保留的形态，就包括由辅音充当的形态，例如：

(8) 播种 现在未完成 ndep

过去 tap

命令 thop (三种词形在卫藏方言拉萨话中合并为 tɔp⁵²)

(9) 驮 现在未完成 ŋgi

过去 kat

命令 khu (三种词形在卫藏方言拉萨话中合并为 kɛ⁵⁵)

这些交替形式中，涉及词根同部位鼻辅音前缀[n] [ŋ]的添加，浊鼻音前缀导致词根首辅音同化为浊音。安多方言恰好也是三大方言中仅有的没有声调的方言。可见，辅音显赫（包括复辅音发达和辅音形态要素的存在）和声调阙如合力抑制了安多方言在现代藏语中的音节显赫度。当然，安多藏语形态比古藏语简化些，很多动词的时态要靠动词后以音节为单位的附加成分表示，没有小于音节的单位，如[rən]、[ret]、[jot]等，音节显赫度仍高于古藏语。

反之，音节结构简单，音素音位分布单一而受限，就会强化音节显赫。彝语支语言就普遍如此，除浊鼻冠音外只有 CV 或至多 CVC 结构。彝语凉山喜德红玛话只有 CV 结构，复辅音和辅音韵尾皆无（有些辅音带同部位鼻冠音），只有 10 个单元音。绝大多数彝语支语言没有 CCV 和 CVC 结构，部分语言有一些复元音 VV 结构。(马学良 2003:408-411) 这使得辅音和元音的分布都受限较大，音节种类较少，加上这些语言都有 3-5 个不等的声调，音节在感知上更加凸显，是藏缅语中音节最显赫的语支，正好也是形态最少、分析性最强的语支。

声调系统发达而稳定的壮侗语和苗瑶语，音节显赫非常明显，毋庸赘言。

2.3 汉藏语言的文字系统中，一部分采用受印度天城体系统影响的音素字母文字，如藏文、傣文。自源的彝语支非音素文字中，有些完全以音节为单位，如老彝文。(丁椿寿 1993:31)

有些是图画文字为主的体系，如纳西文字，虽然与语音单位的关联不那么直接，有时一字表示多个音节，但仍有音节显赫的特征。从傅懋勳(2012)的逐字分析解读看，大部分图画字和象形字还是对应一个音节，尤其是图画字用于假借时都代表一个音节，反映了音节显赫的情况。如下引书中(傅懋勳 2012:56) 6 个字，除第 4 字外，其他都代表一个音节，其中第 3 字除了表示家神所在的竹篓和代指家神外，还可以借它的读音¹su 代指读³su (及现在更常读³sy) 的表“怎么”义的代词。第 6 字用汉字“上”代指读¹sɿ 的表“说”的动词。这

些假借用法的图画字都成为一个音节的符号。

- ④ 读²ni, 在这里表示一天两天的“天”。见经文第15节的解说。
- 1) 画两竖以示二数。读²ni, 意为“二”。²ni²ni意为“第二天”。
- 像家神所在的竹篓。读¹su, 意为“家神”。此处借¹su读³su, 意为“怎么”。在通常情况下多用³sy, ³su是偶尔用之。
- 这是花斑吸风鹰正在说话, 并且准备出发的形象。在这里只能读牠的名字¹ni³dze²gu³ndza, 向三大神¹sa²khui“说出”。
- 这是经文第3节字另一种写法。本读¹sy, 意为“铅”。此处借¹sy读³sy, 是“怎么”“怎样”的意思。
- 这是个哥巴字, 来源于汉字“上”。现在纳西语中没有韵尾鼻音, 读汉字“上”的音近似纳西语“说”的¹sa音, 因此, 借汉语的“上”表示纳西语的¹sa, 意为“说”。

三 汉藏语音节显赫的词汇表征

以汉语为参照, 可以看出汉藏语多少都存在着音节显赫向词汇层面的功能扩张。

3.1 汉藏语言词汇普遍存在显著的音节数制约, 实词绝大部分为单音节和双音节的, 超过双音节的词语很少, 一般会以短语的形式存在, 跟汉语近似。我们来看几例。

戴庆厦、徐悉艰(1995: 9)基于收录词和词素15245个的《景汉辞典》(徐悉艰等1983)统计, 景颇语名词和动词的音节构成分别如下(汉字数字代表词的音节数):

(10) 名: 总数8224: 单545 双4794 三1602 四1177 五77 六21 七7 八1

动: 总数1840: 单1252 双267 三191 四122 五8

跟刘丹青(1993)对汉语口语语体的统计颇为接近, 名词的基本词长是双音节和三音节, 4794+1602=6396, 占总数8224的78%; 动词以单音节为基本词长, 占比为1252/1840=68%。主要差异是景颇语对逾三音节的名词和动词比汉语宽容一些, 汉语基本不接受三音节的动词和四音节以上的名词。不排除景颇语辞典收录时包含了一些实为固定短语的条目。

景颇语的类型在藏缅语中处于居中位置, (参看戴庆厦2000)介于彝语支和羌、藏语支之间。景颇语的词类长度情况或可反映藏缅语音节显赫的平均状态。

再看壮侗语, 以壮语武鸣话为例。根据蓝利国(2016), 单音节单纯词在武鸣话的基本词汇中占绝大多数, 多音节单纯词多是一般词汇中的汉语音译词。武鸣话中也有为数不少的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语素按照一定规则组合构成的合成词。蓝利国(2016)后附词汇表收壮语3040个词, 其中绝大多数为单音节和双音节词, 单音词的比例明显超过汉语, 而超过双音节的只有58个词语, 占1.9%, 其中大部分还是下文谈及的四音格拟声拟态词和一些汉语借词, 也有一些显然是句子形式的俗语。这个词汇表不是基本词汇表, 而是该书所录语篇材料的词汇表, 大致反映壮语词汇音节构成的整体状况, 也反映了壮侗语的整体状况, 即词汇的音节数高度受限, 而壮语词汇比现代汉语更高的单音节性与它更高的音节显赫度是相当一致的。

苗瑶语的情况大致与壮侗语相当, 不再细述。

3.2 汉藏语言音节单位的扩展功能, 还突出体现在四音节词语的显著存在, 刘丹青(1991)在“状态词”框架下对汉藏语言的这类词语有过分析。它们除了常见的拟声功能外, 大部分用来生动描摹人、事物或事件的形象性状态。也有一些四音格词能实现多种语义引申, 如景

颇语中表示两个并列词的上位类别概念。这类四音格大多取对称形式，其中的两个音节或为语义冗余的同义语素重复，或为没有意义、只有语音关系（多为变形重叠）的陪衬音节（配音），重要的是必须构成四个音节。这充分反映了音节数感知在这类描摹词中的作用。下面略举数例：（戴庆厦 2012:272-274）

（11）连绵四音词（不能拆分成更小单位）：

sã⁵⁵luŋ⁵⁵sã³¹la³³ 随从者 mã³¹ʒim⁵⁵mã³¹ka⁵⁵ 强壮状

（12）名词+名词：

kã³¹ʃu³¹kã³¹ʃa³¹ 子孙后代 n⁵⁵sin⁵⁵n⁵⁵toi⁵⁵ 昼夜
孙子 儿子 白天 黑夜

（13）形容词+形容词

kã³¹lu³¹kã³¹pa³¹ 远大，重大 mã³¹kji³¹mã³¹ko³¹ 弯弯曲曲状
长 大 小的弯曲 弯曲

（14）动词+动词

kã³¹tau³³ka³¹tap³¹ 来回折腾状 tʃã³¹san³¹tʃã³¹seŋ⁵⁵ 使清洁
翻腾 顽皮 使清澈 使清除

（15）单纯词+陪衬音节

thin³¹pu³¹thin³¹pjen³ 左邻右舍 sã³¹up³¹sã³¹ap³¹ 紧紧张张地
邻居 （配音） 紧张 （配音）

（16）陪衬音节+单纯词

kum³³pho³³kum³³pha⁵⁵ 各种礼品 tha³³ni³³tha³³na⁵⁵ 永远
（配音） 礼品 （配音） 久

下面再看属于壮侗语族壮傣语支的布依族莫语的 四音格生动式形容词（杨通银 2000:58）和吉卫苗语四音格状词（向日征 1999:68）的例子：

（17）莫语：kau²ŋaŋ¹kau²ŋa:k⁷ 弯弯曲曲的

（18）苗语：pa⁴⁴ta⁴⁴pu⁴⁴toŋ⁵³ 爆裂声

汉藏语系语言有限的多音节词中，这类固定的四音格形式占比很大，语音形式上有类似的重叠或部分重叠（双声叠韵）关系。这类词语同样凸显了音节单位的扩展功能，因为音节数成为这类词语范畴语义的重要承担者，也是多音节词得以成立的关键因素。只有音节显赫的语言才会将多种构词、表义功能寄托在特定的音节数目上。

四 音节显赫的词类表征：音节显赫与量词显赫的相关性

作为独立词类的个体量词（分类词）的存在及其在多数语言中的发达，一向被中外学者视为汉藏语言的重要语法特点之一（如马学良 2003:8，Enfield 2001）。本文将进一步说明，量词显赫跟音节显赫高度相关，也是音节显赫在词类层面的表征之一。

4.1 量词显赫度不但体现在量词的多寡，更体现在功能的强弱，具体如下：

- 1) 个体量词在数词和名词组合时的强制性；
- 2) 个体量词在指示词和名词组合时的强制性；
- 3) 量词的各种重叠形式或构词功能；

4) 量词脱离数词和指示词单独限定名词的功能;

5) 量词自身作为限定词有定指、实指、类指、无定等扩展功能。(参阅刘丹青 2002、2008、2011, 蒋颖 2009)

以此考察, 可以发现汉藏语量词的显赫度跟音节的显赫度(含声调显赫度)存在基本对应的关系。汉藏语言都是个体量词(classifier)入库语言, 但是量词的性质、范围和作用有较大差别, 显赫度悬殊。量词最显赫的壮侗语和汉语粤方言(刘丹青 2000)都是音节和声调最显赫的类型。部分藏缅语言个体量词不发达, 名词和数词之间可以不用个体量词, 这些语言也往往是音节显赫度偏低或声调不入库的语言。对应不太整齐的例子是, 景颇语量词不如羌语支显赫,(戴庆厦 1992)但是音节显赫度至少不低于羌语支语言。

量词在壮侗语中功能特别多样, 可以形成从实词到虚词、前缀的多节点广幅语义图。(参看刘丹青 2011, 覃凤余 2015)壮语量词来自名词, 首先成为一种名词分类词(nominal classifiers), 并获得数词分类词(numeral classifiers)的功能, 此外壮语量词作为显赫范畴还有一系列扩展功能, 并进一步语法化为类别词缀, 简述如下:

1) 量词可以脱离数词和指示词单用, 在特定句式中表示数量为“一”的个体(不定量词则表示不定复数)或周遍性的“每一”等, 例如:(张元生、覃晓航 1993:53, 此处拼写改用国际音标加调类号, 下同)

(19) ki³ pit⁷ nei⁴, pou⁴ tu². 这些鸭子, 每人一只。
些 鸭子 这 个 只

上例中的量词 pou⁴、tu²具有名词代替语(pro-forms)即代名词的性质。

2) 量词可以单独接受后面定语的修饰, 充当被饰代名词, 带有名词化转指功能, 如下三例量词分别代表人类、动物和植物:(张元生、覃晓航 1993:57)

(20) pou⁴ ɕo² 年轻人 tu² pi² 肥的(动物) ko¹ he:n³ 黄的(植物)
个 年轻 只 肥 棵 黄

对这类量词的用法, 张、覃称为名词化。张、覃书中还举了量词加在动词和其他短语前使之名词化的例子:

(21) ɕa:t⁷ (heu³) > fak⁸ ɕa:t⁷ 刷子 ta¹ fa:ŋ² > pou⁴ ta¹ fa:ŋ² 盲人
刷 (牙) 量词 刷 眼 瞎 量词 眼 瞎

下例中四个“量+X”在结构上高度一致, 都是量词核心受后面名词修饰的结构:

(22) tu² nei⁴ tu² rau²? — tu² nei⁴ tu² mou¹. 这只是什么? 这只是猪。(韦庆稳 1982)
只 这 只 哪 只 这 只 猪

这种做被饰代名词的量词有的偏指个体, 有的偏指类, 其位置跟“树”这类实义类别名词是一致的, 比较:

(23) ko¹ rau¹ = fai⁴ rau¹ (韦庆稳 1982)
棵 枫 树 枫

3) 用于类指的被饰量词进一步虚化为表类指的前缀, 念轻声, 例如:

(24) tɕ⁰be⁴ sa:u¹ niu² tɕ⁰məu¹. 羊比猪干净。(梁敏、张均如 1996:887)
羊 干净 过于 猪

上例中的 tɕ⁰来自例(19)、(20)中指动物的量词 tu², tɕ⁰məu¹就是例(20)中的 tu²“只” mou¹“猪”的读音弱化。读音弱化对应于词缀化进程。

4) “量+名”除了作为类指名词语,还常作为有定名词语,这时量词带上定标记(类似定冠词)的功能。如游汝杰(1982)所举的武鸣壮语之例:

(25) koŋ¹ ha:k⁸ ʔeu¹ te¹ pai¹ ham⁶ nai⁴. 那位县官叫他今晚去。
位 县官 叫 他 去 晚 这

(26) pai² nai⁴ ʔan¹ ka:ŋ¹ hi⁴ wai⁶. 于是那个缸也坏了。
于 是 个 缸 也 坏

以上4项,量词除表类别外,还分别发展出独立代名词、被饰代名词兼名词化标记、类指前缀和定冠词等项语法功能。

藏缅语中量词普遍不如壮侗语显赫,以上功能都需要用其他手段来表示,但有少数彝语支语言的量词有定指等指称功能。根据蒋颖(2009:90-91),卡卓语有许多量词可以用在名词后(蒋颖视为后缀),有表示定指和单数的作用,如用于人的量词 zo²⁴:

(27) kɿ³³ ze³³ zo²⁴ 女婿 tshɿ³¹ ma⁵⁵ sɿ⁵⁵ zo²⁴ 新娘
姑爷 个 媳妇 新 个

另据蒋书的说法,桑孔语量词也可以单用在名词后,表示单一量,兼有指示的作用,如:

(28) ta³¹ zuŋ³³ aŋ⁵⁵ (这/那)位客人 a⁵⁵ qha³³ phuŋ⁵⁵ (这/那)件衣服
客人 个 衣服 件

大部分藏缅语的量词没有这类扩展用法,有些甚至数名组合可以或者经常不加量词。

4.2 戴庆厦(1997)注意到,藏缅语内部量词的发达程度跟基数词(指基本基数词)的音节数有关。基数词以单音节为主,则量词发达;基数词以双音节为主,则量词不发达。戴先生从节律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单音节数词配量词,正好成一个双音节组合,跟双音节化的名词配合,可以增加“整个语言双数节律的强度”。而双音节数词本身就跟双音节名词相配,量词使用的需求就不大。刘丹青(1988)也曾从音节角度分析过现代汉语量词在数量词作为支撑词时的作用,指出在名词双音化的大背景下,“数词是单音节的,不宜于充当一个完整的造句单位,‘者’在口语中早就不能产了,于是,量词就成了这种时候最好的‘支撑词’”,如“三座桥炸毁了两座”、“书店来了好多新书,我也买了几本”等。在有声调的前提下,单音节词越丰富的语言,音节越显赫,例如壮侗语和汉语粤方言。基数词用单音节的藏缅语,自然也比基数词主要用双音节的语言音节显赫。汉语和藏缅语量词的产生,与双音化时代基数词仍然保持单音节性有关,反映了量词显赫跟音节显赫的相关性。至于壮侗语和粤语,本身都是音节显赫度最高、量词显赫度也最高的类型,音节显赫和量词的相关性表现得最突出。关于音节显赫向量词扩展的原因,文末还将有进一步探讨。

以上分析也展示了量词显赫度跟声调相关。声调最显赫的语言方言,如壮侗语和汉语粤方言,正是量词最显赫的类型。而没有产生声调的藏缅语,主要是偏西或西北的一些藏缅语,保留了汉藏共同语早期的状况,它们也都是量词不发达的语言。声调是音节显赫的主要表现之一,量词显赫跟声调显赫的相关性,同样展示了音节显赫向词类领域的扩展。

五 音节显赫的句法表征:音节显赫与连动式显赫的相关性

5.1 连动式的界定和显赫度指标

参考Aikhenvald(2006)和Haspelmath(2016),结合对汉语和民族语言连动式的研究,

我们确定的进入语法库藏的连动式具有以下特征：（详参刘丹青 2015）

- 1) 几个动词或动词短语直接连用，中间没有停顿，没有任何标注并列关系或从属关系的功能成分，使用统一的句调；
- 2) 动词短语之间没有主谓、话题-述题、动宾等论元性关系；
- 3) 整个命题表示单一事件或单一命题，单一事件内部可以包含若干个微事件；
- 4) 单一事件内微事件之间的语序符合时间顺序象似性。

根据以上特征，以并列连词连接的或一方为副动词的动词短语都不是连动式。据此，阿尔泰语一般不存在连动式。汉语被划入连动的结构中，也有一些不是真正的连动式，而是话题-述题结构，例如：（参看黄哲、刘丹青 2018）

（29）小张学习认真，工作积极，为人热情。（“学习”“工作”“为人”都是语域式话题）

（30）他吃起来很快，走起路来可慢死了。（“吃起来”“走起路来”都是条件性话题）
连动式入库之后还有是否显赫的问题，显赫度有一些测试标准：

- 1) 连动式的动词类别多样，没有一方限于“来、去”等基本位移动词；
- 2) 连动式对动词短语数量没有严格限制；
- 3) 连动式之间语义关系比较多样，其中包括一些在其他语言中常用并列或主从的手段来表示，属于连动式的扩展功能。

5.2 不同语言连动式的显赫度

根据以上标准，汉藏语绝大多数语言是连动式入库语言，但是只有部分语言是连动式显赫的语言，包括汉语、壮侗语、部分苗瑶语和部分彝语支语言。大部分藏缅语是连动入库而不显赫的语言，主要的连动式是来去动词跟其他动词的组合，甚至有连动式不入库的。连动式的显赫度与形态显赫成显著的反比关系，详见刘丹青（2015）。下面择要介绍。

壮侗语跟汉语同为连动式最显赫的语言。Enfield（2007:339）将连动句称为多动词构式（multi-verb construction），他说“老挝语强大能量的一部分就是能造出在表层结构中排上多达6个以上动词的长长的神奇构式”。例如：

（31）caw⁴ lòng² qaw³ paj³ hêt¹ kin³ beng¹ mèè⁴. 你尽管拿（它们）试煮一下吃吧。
你 试-出 拿 去 做 吃 看 祈使语气

何彦诚（2014）充分展示了红丰佬语连动式的显赫性，例如：（注释有技术性调整）

（32）(.....)tshai³¹ tsh⁵⁵ lun³¹ huai⁴³ xa⁴³ khi⁴³.（何彦诚 2014:31）
然后 拿 来 切碎 炒 吃
.....然后拿来切碎了炒着吃。

（33）ziu⁴³ ga³⁵⁴⁻¹³ ga¹³ pan¹³ si⁵⁵ hue⁵⁵ dia⁴³ nuan³¹, tsh⁵⁵ tchi⁴³ lun³¹ xe⁴³ gau⁴³.
去 抓（话题）抓 得 一 小口袋 银子 拿（持续体）来 家（状态变化）
去抓呢，抓得一小袋银子，即带着回家来了。（同上:103）

苗瑶语也有超出基本位移动词的连动式，例如红瑶所说的优诺语：（毛宗武、李云兵 2007:114）

（34）nan²² pui³⁵ nan³³ kə³³ tʰan¹³ man³⁵ no²². 他睡在床上看书。
他 睡 在 床上 看 书

在藏缅语族中彝语支是分析性最强的，下面是毕节彝语的连动句例：（丁椿寿 1993:384）

（35）tʰi²¹ tʰo¹³ ve³³ nɔ³³ su³³ bei¹³ tʰei³³. 他穿了衣服走出去。

- 他 衣服 穿 好 走 出 去
 (36) $\eta v^{21} \text{ni}^{21} \text{za}^{13} \text{su}^{33} \text{na}^{33} \eta go^{33}$. 我坐下写字。
 我 坐 下 字 写

景颇语支的形态介于分析性的彝语支和综合性较强的羌语支、藏语支之间，连动式入库。戴庆厦（2012:346）3.6节专讲景颇语连动式，它们“大多是由两个动词连用的，其次是三个动词连用的，也有少数是四个动词连用的”。例如：

- (37) $j\dot{i}^{33} ko^{31} \text{sum}^{33} pji \text{wa}^{31} jo\eta^{31} tum^{31} j\ddot{a}^{31} zo\eta^{31} to^{33} \eta a^{31} ai^{33}$.
 他 话题标记 笛子 回 抽吹 使响 在 貌标记 句尾词
 他回去吹响了笛子。

此句看似有三个动词，但是其中 wa^{31} “回”属于位移动词， $j\ddot{a}^{31} zo\eta^{31}$ “使响”则可能是结果补语。此句不一定是显赫类型的连动句，而属于起点级的连动式。

在形态较丰富的羌语支语言中，观察几种描写报告，多数没有连动句存在的迹象，一些动词连用的句式使用了状语标记，只有麻窝羌语的例子中有个别疑似连动句：

- (38) $qa \text{tianjin} ei \text{ma} \text{tsi} k\ddot{a} \text{mapts}hi$. 我不去看电影不行。（刘光坤 1998:195）
 我 电影（助）不 看 去 不行

此句一个动词是基本位移动词，而且语序不符合时间顺序象似性，不是典型的连动句。

藏语支语言也没有看到连动句的明显迹象，我们在白马语的语料中看到个别带来去义动词的动词连用例：

- (39) $mdzi^{53} m\ddot{a}^{13}! ti\ddot{a}^{35} i^{53} ta^{13} ndzi^{53}$. 走，看电影去。（孙宏开等 2007:132）

走（语气）电影 看 去

这种起点级连动句或存在于连动不显赫的多种藏缅语中，只是有的语法书没有记录到。

孙宏开等（2007:98-99）记述的白马语的三种动词连用情况，大致反映了连动式不显赫的情况。第一种是用连词 ni^{53} 的，可以排除；第二种是行为动词和能愿动词连用的，也可以排除；只有第三种是行为动词和来去动词连用的，属于起点级连动式或动趋式：

- (40) $\eta a^{35} kho^{53} ue^{35} ue^{13}$ 我背来了 $kho^{13} ne^{53} kho^{53} tche^{13}$ 他背去了
 我 背 来（已行） 他 背 去

关于连动句的扩展功能，由于材料检视得不够，暂时还不能深入描写，但是从汉语的情况推断，连动显赫的藏缅语，连动句应当存在一定的扩展功能。

连动式在汉藏语系内部由强到弱的地理和谱系推移——从东南到西北，从壮侗苗瑶语言到彝缅语言和景颇语支再到羌藏语支，与音节显赫的地理和谱系推移是一致的，与量词由强到弱的推移方向也基本一致。三者大致是如下的情况：

- (41) 显赫 $\leftarrow$ $\rightarrow$ 不显赫
 音节 汉语/壮侗/苗瑶 彝缅语 景颇语支 羌语支 藏语支
 量词 汉语/壮侗 苗瑶 彝缅语 羌语支 景颇语支 藏语支
 连动 汉语/壮侗 苗瑶 彝缅语 景颇语支 羌语支 藏语支

连动和音节显赫相关的原因，可能主要在于形态。音节显赫语言都是形态不发达、分析性强的语言，而连动式与形态明显地负相关，形态越发达（朝西北方向），连动式越不发达。对此，下文还有进一步讨论。

六 汉语方言内部诸范畴的显赫度

汉语方言间的类型差异小于语言间的差异，但是各范畴大体上也呈现出与上述地理分布类似的格局。面对数量庞大的方言，本文只能作最简单的勾勒。

音节显赫度，从材料获取方便考虑，本文以声调的数量作为参照。正像汉藏语言所呈现的分布模式一样，各方言调类的多寡也反映声调的显赫度，而声调的显赫度是音节显赫度的主要表现之一。从曹志耘主编（2008）语音卷第一图可见，汉语方言调类数量从2种到13种不等，不同调类数的方言分布如下（省名后的数字代表地图中的方言点数目）：

（42）13调2种：广西1，江西1

11调1种：江西1

10调16种：广东8，广西7，海南1

9调51种：广东22，广西21，海南2，福建2，浙江2，江西1，江苏1

8调113种、7调151种：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南部、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江西

6调161种：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安徽

5调127种：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

4调268种：主要分布在华北、东北、华中、西南各省

3调38种：宁夏、甘肃、青海、新疆

2调1种：甘肃

以上分布显示，9-13种的为调类极多方言，主要分布在最南端的广东广西海南，江西有个别点；5-8种为调类较多方言，主要分布在长江和南岭之间；4种为与普通话齐平的调类偏少方言，主要分布在官话方言区；3种为调类稀少方言，全部分布在西北（含青海）；2种为调类极少方言，只有西北的甘肃有。从东南到西北调类逐渐减少的大势非常明显。

音节显赫的词汇表征，比较突出地体现在单音节词的比例方面。《汉语方言学大词典》（詹伯慧、张振兴 2017）进行了54个方言代表点702个词目（覆盖了最重要的基本词汇）的对照。在这些基本词中，可以看到不少普通话及官话为双音节、多音节的词项，在南方多种方言中表现为单音节词项，反过来的情况则几乎没有，个别例外也只见于南北的个别方言。例如（普通话词目除加说明的之外，在官话中都是双音节或多音节词）：

（43）月亮 杭州、福州：月

石头 温州：岩；广州、香港、福州、建瓯：石

筛子 金华、广州、香港、东莞、封开、韶关、潮州、海口、于都、绩溪：筛

茄子 宁波、建瓯、厦门、潮州、雷州、海口、文昌、绩溪：茄

知道 广州、香港、澳门、东莞、封开、藤县、潮州、雷州、海口、文昌、南昌：知（官话区有牟平一地用“知”）；福州：晓

再看量词，从量词的扩展功能来看，量词最发达的方言是粤语，其次是吴语及部分闽语（潮汕、海南）、湘语、徽语、部分客家话，还有个别官话方言，这些方言都至少具有动词前量名组合表有定的功能。（刘丹青 2000，王健 2013）最不发达的是西北方言——量词库藏

贫乏、“个”化（用广谱量词“个”代替具体的量词）严重。华北东北地区量词也有衰退迹象，表现在“一、二、三”与量词“个”发生合音或脱落，阳平的“一”和“俩、仨”可以直接限制名词。（参看刘丹青 2008）这一分布态势与声调和音节显赫的分布也是基本一致的。

连动句在现代汉语各方言中都比较发达，差异不大，在方言语法描写中通常不被注意，也难以确切比较，但是有一些西北混合型方言连动句出现萎缩迹象，而且伴随着其他两个参项的相关现象。周晨磊（2016）简要描写了青海贵德周屯方言的连动句。周屯方言是一种深受周边藏语影响的混合型方言，语序类型已经完全是SOV。我们注意到其中的连动式例句都没有动词直接组合的例子，两个动词之间一定以体标记相隔，例如：

- (44) 阿吉他门啊_{宾格}搽推开了进来了。 他推开门进来了。
 (45) 扎西饭吃上了去了。 扎西饭吃了走了。
 (46) 牛、羊、马一满跑了出来了个。 牛、羊、马全部跑出来了。
 (47) 连珉跑_着过来了。 连珉跑过来了。
 (48) 我房子里酒个啊两瓶拿了去了。 我拿了两瓶酒去房子里了。

可以认为，这里的体标记兼有某种联系项的作用，所以必须出现。而且，周屯电话的连动句主要用于来去义动词与行为动词的组合，亦即主要是起点的连动式。此外，在周晨磊的对比分析中我们看到，西宁话的连动句在周屯电话中会对应以连词连接的非连动句，如：

- (49) 西宁：我们料子买上了做衣裳。~ 周屯：我们料子买上_{de}连词衣裳做。

与此同时，周屯电话是声调不发达方言。根据周文的描写，周屯电话只有两个单字调，而且两个调的区别性不强：

对于单字而言，两个声调13和44确实可以区别意义，如平声的miã¹³“绵”和去声的miã⁴⁴“面”，但是进入词以后，声调区分意义的作用就消失了。比如在miã¹¹iã¹³“绵羊”和tɕio⁴⁴miã¹¹“酵面”里，“绵”和“面”均读为miã¹¹。另一方面，同样是“面”，有时读为44调（如miã⁴⁴tɕi¹¹“面筋”），有时读为11调（如tɕio⁴⁴miã¹¹“酵面”）。当然，由于有连读变调的可能，一个音节单独使用时的声调并不总是和其处于词中时的声调一致。但是我们在考察后（详见本章第四节）并未找出周屯电话连读变调的准确规律。……作用于单字上的声调变得难以捉摸，虽然在部分情况下（即单字成词时）可以区分意义，但也有很多情况下不能。

此外，周屯电话也是量词不显赫的方言，“个”化非常严重，看周文的说明：

相对而言，专用量词的数量较少，临时借用的量词数量较多。临时的量词可以原本是名词（如“瓣”），也可以是动词（如“捉提”）。另一方面，虽然专用量词本身的数量不如临时量词多，但其中的“显赫”量词“个”在使用频率上远远超过所有其他量词。“个”可以搭配的名词十分多，很多情况下，在普通话中要用其他量词，周屯电话中都用“个”。下面的名词都可以和“个”搭配：一个被/笔/虫/大门/灯/地方/飞机/佛/马/毛巾/帽子/铺子/枪/桥/树/椅子/猪/桌子……

周屯电话作为一种混合型方言，音节（声调）、量词、连动三个参项都不显赫，符合其西北的地理位置，凸显了音节显赫、量词显赫和连动显赫三者的高度相关。

七 结语与余论

7.1 本文主要揭示了以下事实：

1) 汉语及汉藏语言总体上具有音节显赫的特点, 音节显赫既表现在音节自身的凸显度高, 也表现在其扩展功能强, 在词汇、词类(量词)、句法(连动式)等方面都有表征, 甚至影响到文学和文化。因此, 音节显赫是汉藏语系带有根本性的类型特点, 其他许多特点(包括但不限于本文所说的几个方面)都由这一特点派生或强化。

2) 汉藏语言内部, 甚至汉语方言内部, 音节显赫度仍有较大差异, 而且音节显赫与词汇的音节数敏感和限制、量词显赫、连动式显赫显著成正比, 成同一方向的地理和谱系推移, 即各项显赫由东南到西北逐级减弱, 形成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也说明这几个参项的类型差异, 不完全是谱系现象, 接触和区域语言因素也有显著的作用。例如彝语在这些方面与邻近的壮侗苗瑶语接近, 而与羌、藏语支等同属藏缅语的语言相距更远; 粤语与壮侗语言更接近, 而与西北汉语相距更远。

7.2 对音节显赫扩展功能的补充分析

音节显赫是音系类型的特征, 却影响到词汇、词类、句法等层次。这种影响的具体成因, 还可以进一步探讨。

音节显赫的语言, 母语人对音节的感知最强烈, 对词语的音节数特别敏感, 不同词类和词语类别都有音节数限制, 音节数兼具词汇类别的标识作用, 是一种功能扩展。

音节显赫的语言形态难以发达, 因为对低于音节的音位层感知薄弱, 语音操作基本在音节层进行。若有形态变化, 形态的单位成本较大, 也可能破坏词汇单位的音节数秉性, 进而影响到对韵律敏感的句法规则, (参看刘丹青 1986、1993、1996) 因而音节显赫语言的形态通常会受抑制。而低于音节的音段音位较显赫的语言, 形态操作常在音位层进行, 单位成本较低, 使这类语言能容纳较丰富的形态。这就是音节显赫和形态显赫呈负相关的理据。

音节显赫和形态显赫的负相关, 是造成音节显赫其他语法表征的关键因素。

量词的出现和显赫, 同时跟数词的单音节性和名词的双音化有关(4.2), 根本上仍跟母语人对音节数的敏感有关。在声调产生之前, 音节显赫度还不够高, 音节敏感性还不够强, 那时候还不可能形成量词显赫。

量词显赫还与音节显赫语言的形态贫乏有关。一种语言各范畴的形态普遍不发达, 数形态自然也不发达。数范畴是名词个体化的重要途径, 音节显赫语言的数范畴不发达, 给量词发生发展留出了空间, 名词个体化的功能需求就由量词来完成。大河内康宪(1993[1985])、Bisang(1999)、Rijkhoff(2002:50)都将个体化列为汉语一类语言中量词的重要功能。

连动显赫跟形态显赫是负相关关系。形态发达和注重形式标记的语言, 会将连动式中近于主从关系的结构用从属标记(分词形态或副动词形态、状语标记等)表示, 近于并列的结构会采用并列连词。阿尔泰语言或偏西的藏缅语都如此, (刘丹青 2015) 这些语言很难发展出连动式。东亚地区, 连动式只出现在形态少的语言中, 而音节显赫是形态少的直接原因。于是, 连动式成为音节显赫在句法层面的表征。^①

7.3 音节显赫及相关参项的区域属性

音节显赫及几个相关参项, 显著呈现出从东南到西北渐降的同步地理推移模式。这一格

^① 以上分析, 还可以带出一个相关的推论。古代汉语是非量词语言, 并列显赫(梅广 2004)、连动式不发达(张敏等 2009), 音节显赫度的细节还不太确定(复辅音、浊塞音韵尾、有无声调等, 都有争议)。在东亚地区, 量词不显赫、并列显赫和连动式不显赫的语言形态都较为丰富(藏语支、羌语支等)。由此看来, 古代汉语很难是完全没有形态的语言, 汉字可能确实掩盖了一些形态的存在。

局的形成,既有参项之间的蕴含和谐关系,也有区域语言学的原因,相邻接触的动因至少不小于谱系动因。汉-藏缅的亲缘关系比汉-壮侗苗瑶的亲缘关系近,但是在本文讨论的几个参项上,汉语更接近于壮侗苗瑶语,而与藏缅语尤其是西部的藏缅语更远。汉语方言中,东南方言更接近壮侗苗瑶语,都是音节显赫、量词显赫、连动显赫并存;西北方言则有接近西部藏缅语及阿尔泰语言的特征,音节、量词和连动的显赫度都显著低于东南方言。其他北方方言则介于两者之间。彝语支语言在亲缘关系上当然与其他藏缅语更接近,但是在音节显赫、量词显赫和连动显赫方面,与邻近的壮侗语更接近,而与较远的西部藏缅语较远。语言接触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参考文献

- P. K. 本尼迪克特著, J. A. 马提索夫编, 乐赛月、罗美珍译:《汉藏语言概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 1984年。
- R. L. Trask 编著:《历史与比较语言学词典》(*The Dictionary of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年。
- 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 商务印书馆, 2008年。
- 陈宁萍:《现代汉语名词类的扩大——现代汉语动词和名词分界线的考察》,《中国语文》1987年第5期。
- 大河内康宪著, 靳卫卫译:《量词的个体化功能》, 载大河内康宪主编《日本近、现代汉语研究论文选》,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1985]年。
- 戴庆厦、徐悉艰:《景颇语词汇学》,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5年。
- 戴庆厦:《藏缅语族个体量词研究》, 载《彝语研究》编委会编《国际彝语学术会议论文集·彝语研究》,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年。
- 戴庆厦:《景颇语参考语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年。
- 戴庆厦:《论景颇语在藏缅语中的地位》,《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 丁榕寿:《彝语通论》,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3年。
- 弗雷德·卡尔森著, 黄保罗译:《芬兰语语法》,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 傅懋勳:《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12年。
- 黄哲、刘丹青:《试析汉语中疑似连动式的话题结构》,《世界汉语教学》2018年第1期。
- 黄成龙:《蒲溪羌语研究》, 民族出版社, 2006年。
- 蒋颖:《汉藏语系语言名量词比较研究》, 民族出版社, 2009年。
- 蓝利国:《壮语语法标注文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6年。
- 李翊燮、李相忆、蔡琬著, 张光军、江波译:《韩国语概论》,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8年。
-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概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
- 刘丹青:《词类和词长的相关性——汉语语法的“语音平面”丛论之二》,《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 刘丹青:《从状态词看东方式思维》, 载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编《东方文化》第1集, 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1年。
- 刘丹青:《对称格式的语法作用及表达功能》, 载北京市语言学会编《语文知识丛刊》第3辑, 地震出版社, 1982年。
- 刘丹青:《汉语的若干显赫范畴:语言库藏类型学视角》,《世界汉语教学》2012年第3期。

- 刘丹青:《汉语及亲邻语言连动式的句法地位和显赫度》,《民族语文》2015年第3期。
- 刘丹青:《汉语类指成分的语义属性和句法属性》,《中国语文》2002年第5期。
- 刘丹青:《汉语量词的宏观分析》,《汉语学习》1988年第4期。
- 刘丹青:《汉语名词性短语的句法类型特征》,《中国语文》2008年第1期。
- 刘丹青:《汉语形态的节律制约——汉语语法的“语音平面”丛论之一》,《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又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3年第3期。
- 刘丹青:《苏州方言重叠式研究》,《语言研究》1986年第1期。
- 刘丹青:《语言库藏类型学构想》,《当代语言学》2011年第4期。
- 刘丹青:《粤语句法的类型学特点》,《亚太语文教育学报》2000年第2期。
- 刘光坤:《麻窝羌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
- 陆俭明、郭锐:《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所面临的挑战》,载陆俭明主编《面临新世纪挑战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 陆俭明:《我关于“字本位”的基本观点》,《语言科学》2011年第3期。
- 吕叔湘:《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国语文》1963年第1期。
- 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民族出版社,2003年。
- 毛宗武、李云兵:《优诺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
- 梅广:《迎接一个考证学和语言学结合的汉语语法史研究新局面》,载何大安主编《古今通塞:汉语的历史与发展》,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2003年。
- 施向东:《梵汉对音与古汉语的语流音变问题》,《南开语言学刊》2002年第1期。
- 孙宏开、齐卡佳、刘光坤:《白马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
- 孙宏开:《原始汉藏语的复辅音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一》,《民族语文》1999年第6期。
- 覃凤余:《壮语分类词的类型学性质》,《中国语文》2015年第6期。
- 王健:《类型学视野下的汉语方言“量名”结构研究》,《语言科学》2013年第4期。
- 王力:《汉语史稿》(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
- 王志洁:《北京话的音节与音系》,载徐烈炯主编《共性与个性——汉语语言学中的争议》,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年。
- 韦庆稳:《论壮语的量词》,载《民族语文》编辑部编《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
- 温昌衍、温美姬:《“子变”补说》,《中国语文》2004年第1期。
- 吴宇虹等:《古代西亚塞姆语和印欧语楔形文字和语言》,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 向日征:《吉卫苗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
- 信德麟:《拉丁语和希腊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
- 徐悉艰、肖家成、岳相昆、戴庆厦:《景汉辞典》,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
- 杨通银:《莫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
- 游汝杰:《论台语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民族语文》1982年第2期。
- 詹伯慧、张振兴主编:《汉语方言学大词典》,广东教育出版社,2017年。
- 张敏、李予湘:《先秦两汉汉语趋向动词结构的类型学地位及其变迁》,“汉语‘趋向词’之历史与方言类型研讨会暨第六届海峡两岸汉语史研讨会”论文,台北,2009年。
- 张洪明:《韵律音系学与汉语韵律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当代语言学》2014年第3期。

- 张元生、覃晓航：《现代壮汉比较语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 周晨磊：《青海贵德周屯方言参考语法》，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6.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In Aikhenvald, Alexandra Y. & R. M. W. Dixon (eds.)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pp.1-68.
- Bisang, Walter. 1999. Classifier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counting and beyond, in: Gvozdanovic, Jadranka (ed.), *Numeral types and changes worldwide*, 113-185.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Enfield, N. J. 2001. On genetic and areal linguistics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parallel polyfunctionality of 'acquire'. In Alexandra Aikhenvald & R. M. W. Dixon (eds.) *Areal Diffusion and Genetic Inherit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55-290.
- Enfield, N. J. 2007. *A Grammar of Lao*.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Haspelmath, Martin. 2016. Th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Comparative Concept and Cross-linguistic Generalization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7(3): 291-319.
- Matisoff, James. 1991. Areal and universal dimensions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Lahu. Elizabeth C. Traugott & Bernd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II, 383-453.
- Rijkhoff, Jan. 2002. *The Noun Phra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bstract] In the light of the “mighty category”, a concept in Linguistic Inventory Typolog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henomenon of “syllable mightiness”, including contributions made by tones, in Chinese and other Sino-Tibetan languages, as well as the representations of syllable mightiness at the levels of lexicon, grammar, and eve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particular, it demonstr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yllable-mightiness and classifiers- and SVCs-mightiness. Such representations can be viewed as the trans-level expansion of syllables as a mighty category. This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syllable mightiness varies significantly among Sino-Tibetan languages. That is, the Zhuang-Dong and Miao-Yao languages in the southeast attest the strongest syllable mightiness, while a geography-wise tendency of weaker and weaker mightiness is seen in languages in the northwest. Yet, languages of the Yi group, distributed mainly at the southeastern end of the Tibeto-Burman branch, are also deemed syllable-mighty in comparison to other Tibeto-Burman languages. Similar geographical patterns are found in Chinese dialects. Such areal feature shows how language contact may have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syllable mightiness.

[Key words] syllable mightiness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representations Sino-Tibetan languages classifiers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SVCs)

（通信地址：100732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02488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